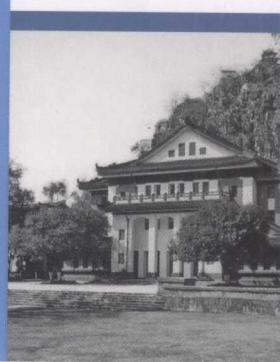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行政人的非理性世界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The Irrational World of Administration Men:
A Research on Irrationality Dimension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苏曦凌/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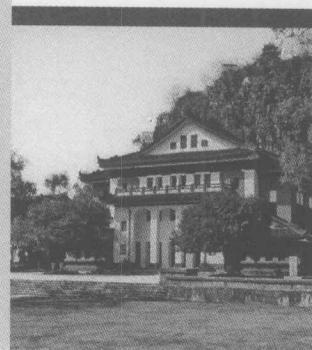
013067630

D035

499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行政人的非理性世界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The Irrational World of Administration Men:
A Research on Irrationality Dimension of
Admini making



北航

C1675424

光明日报出版社

苏曦凌/著

D035

4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政人的非理性世界：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

苏曦凌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7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5060 - 5

I. ①行… II. ①苏… III. ①行政管理—决策学—研究

IV.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714 号

行政人的非理性世界：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著 者：苏曦凌

责任编辑：祝 菲 李艳芳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靖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51（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ufei@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690 × 975 1/16

字 数：225 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5060 - 5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YES 目 录

第1章 导论 / 1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1.1 选题来源 / 1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1.2 选题背景 / 3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1.3 选题意义 / 7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11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1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7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3 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 22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3.1 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 22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3.2 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说 / 23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24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1.3.4 本文研究的基本内容 / 25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第2章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27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2.1 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 / 27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2.1.1 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概说 / 28	001 \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1



2.1.2 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理论硬核 / 29
2.1.3 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追问与质疑 / 32
2.2 哲学认识论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 37
2.2.1 认识论的流变彰显了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必要性 / 38
2.2.2 认识论的成果论证了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可行性 / 40
2.3 心理学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 44
2.3.1 心理学的学科内涵 / 44
2.3.2 现代心理学各流派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贡献 / 46
2.4 前景理论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 / 51
2.4.1 前景理论的产生背景 / 52
2.4.2 前景理论的基本内容 / 55
2.4.3 前景理论在决策分析中的应用前景 / 58
2.5 本章小结 / 59

第3章 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 60

3.1 非理性因素的概念界定 / 60
3.1.1 认识非理性因素的基本视角 / 61
3.1.2 非理性因素的内涵 / 64
3.1.3 非理性因素的外延 / 66
3.2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的自组织作用 / 68
3.2.1 自组织理论概说 / 68
3.2.2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之自组织作用的发生条件 / 71
3.2.3 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的自组织形态 / 73
3.3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的功能形态 / 88
3.3.1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的功能形态概说 / 88
3.3.2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的功能的理想形态 / 90
3.3.3 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因素的功能的不理想形态 / 97
3.4 本章小结 / 100

第4章 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分析 / 102

4.1 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本质属性 / 102



4.1.1 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本质属性 / 102	102
4.1.2 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本质属性 / 112	112
4.2 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 / 119	119
4.2.1 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基本类型 / 119	119
4.2.2 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基本表现 / 120	120
4.3 群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 / 128	128
4.3.1 群体决策的心理环境 / 128	128
4.3.2 群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特征 / 131	131
4.3.3 群体层面的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的生成逻辑 / 135	135
4.4 本章小结 / 140	140

第5章 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实证分析 / 141	141
5.1 前景理论在行政决策领域的适用性实验 / 141	141
5.1.1 实验设计 / 142	142
5.1.2 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 145	145
5.1.3 前景理论的主要效应在行政决策中的检验与分析 / 147	147
5.1.4 基本结论 / 150	150
5.2 行政决策主体认知偏差的检验分析 / 150	150
5.2.1 过度自信效应检验 / 150	150
5.2.2 后见之明效应检验 / 151	151
5.2.3 反应过度效应检验 / 151	151
5.2.4 沉没成本效应检验 / 152	152
5.2.5 框架效应检验 / 153	153
5.3 行政决策的行为模式考查 / 154	154
5.3.1 行政决策的动机模式考察 / 154	154
5.3.2 行政决策的行为方式考察 / 156	156
5.4 本章小结 / 160	160

第6章 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路径分析 / 161

6.1 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行政决策制度 / 161	161
6.1.1 行政决策制度的内涵 / 162	162



6.1.2 行政决策制度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167
6.1.3 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制度安排 / 169
6.2 营造良好的行政组织气氛 / 176
6.2.1 行政组织气氛的内涵 / 176
6.2.2 行政组织气氛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178
6.3 促进行政伦理的内化 / 184
6.3.1 行政伦理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184
6.3.2 行政伦理的内化机制分析 / 186
6.3.3 行政职业伦理教育的基本模式 / 189
6.4 科学地运用行政决策技术 / 191
6.4.1 行政决策技术的概念阐释 / 191
6.4.2 行政决策技术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193
6.4.3 科学地运用行政决策技术 / 195
6.5 本章小结 / 200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201
7.1 研究结论 / 201
7.2 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204
参考文献 / 205
附 录 / 214
1.1.1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的特征 / 214
1.1.2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的成因 / 214
1.1.3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的危害 / 214
1.1.4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的调适 / 214
1.1.5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的制度安排 / 214
1.1.6 行政组织气氛的内涵 / 214
1.1.7 行政组织气氛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214
1.1.8 行政伦理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214
1.1.9 行政伦理的内化机制分析 / 214
1.1.10 行政职业伦理教育的基本模式 / 214
1.1.11 行政决策技术的概念 / 214
1.1.12 行政决策技术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调适功能 / 214
1.1.13 科学地运用行政决策技术 / 214
1.1.14 本章小结 / 214



第1章

导论

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为了表征事物的不同方面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具体情态，人们往往使用“维度”（dimension）这一概念予以描述、度量、分析。所谓“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是指行政决策的非理性方面的问题及其理解。在本章中，笔者力图在分析这一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提出关于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的理论构想，从而为全文确立逻辑线索与技术路线。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来源

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不仅需要着眼于体制、制度、技术、方法等“物”的因素，而且需要充分重视需要、情感、意志、利益等“人”的因素。由于各种“物”的因素总是由“人”来发明、创造、使用和控制的，因而相对于“物”的因素而言，“人”的因素是行政生活中更为能动的主体性构成要素。可以说，“人”的因素的活动状态与功能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成败。所以，对“行政人”的研究应当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方面。然而，由于深受政治学、行政学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①，对“行政人”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如凤毛麟角，十分匮乏。同时，在十分有限的关于“行政人”的讨论中，研究者又往往将“经济人”分析框架套用

^① [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页。



到“行政人”的身上，将“行政人”简单、抽象地规定为能够趋利避害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主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它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①可见，马克思并不同意把人的本性仅仅归结为理性，而是认为直观、情感、愿望等非理性因素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纯粹以理性维度来界定和分析“行政人”不仅是一种人性假设的片面，而且必然会无法解释形形色色的、丰富多彩的行政生活实践，更无法客观地描述行政主体的行为活动规律。

康德（Immanuel Kant）有一句名言：“感性无理性则盲，理性无感性则空”。^②人的精神世界是由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人的精神世界不仅包含着具有自觉性、逻辑性、抽象性的理性逻辑思维，从而具有规范性、自觉性和秩序性等理性行为特征，也包含着需要、情感、意志、信念、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具有非理性行为倾向。同样的，就其精神世界的结构而言，“行政人”不仅具有理性的逻辑思维，而且具有丰富的非理性因素；就其行为方式的表现而言，“行政人”不仅具有理性行为特征，而且具有非理性行为倾向。所以，对“行政人”的分析与界定，不仅应当既看到其合逻辑的理性层面，而且应当重视由直觉、经验、情感等因素主导的非理性层面。行政决策是决策主体“基于决策实践而预先以观念的方式对行政决策成果所作的把握”^③。在这一过程中，决策主体需要对各种决策信息予以查知、认识、分析和判断，因而这一过程能够充分展现出“行政人”的各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活动状态，为“行政人”的非理性层面的界定与分析提供现实的、具体的研究领域。由此，我选择以行政决策行为作为突破口，试图探索“行政人”的各种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活动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页。

③ 颜佳华：《行政哲学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规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当今中国的行政决策实践来看，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在现实的行政决策活动中，有的决策者囿于自身的经验，奉行“拍脑袋决策”，在决策时既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听不进专家和群众的不同意见；有的决策者仅从自身的需要和情感出发，以一己之好恶作为选择决策方案的唯一标准，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有的决策者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施行“一言堂”式的专断，罔顾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使得决策集体内部群体极化现象严重。对于以上所列种种现象，单纯的理性维度不仅无法予以解释，亦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消解路径。行政决策实践过程中的这些现象不仅印证了本书选题的科学性，而且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动力。

1.1.2 选题背景

与行为主体精神世界的理性与非理性二分相对应，对于行政决策的研究，可以因循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分析维度：一个是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一个是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所谓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是指着眼于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数理统计、运筹学为研究工具，以理性的备选方案设计为研究内容，以建立理性决策模型为研究结果的规范性研究形式。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则是指着眼于主体的非理性倾向，以社会学、心理学为研究工具，以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作为研究内容，以归纳主体的行为特征、合理调适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为研究结果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的研究形式。

本研究课题的提出具有独特的思想背景与实践背景，既离不开“有限理性”的理性观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亦离不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应对本学科知识增长的要求而引发的理论自觉，更是提高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

1. “有限理性”的理性观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大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即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提出以前，全面理性的理性观在管理哲学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们就认为人是全面理性的，其行为是由理性驱使的，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如疲劳、醉酒或愤怒时，人们的思维分析与选择活动才是非理性的。在全面理性观看来，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价值，它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而且是度量事物的价值与意义的基本标准和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① 所以，全面理性观认为情绪、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常常会劫持、裹挟、误导主体的思维活动，使其无法在决策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于是，受全面理性观的影响，人们在研究决策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在设法回避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对于决策活动的影响，甚至认为理性的、理想的决策活动就是排除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干扰。因此，全面理性的理性观将非理性因素从主体的精神世界中剥离出去，将主体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包含逻辑推理能力和功利目标诉求的理性。同时，它过分强调主体理性推理能力的绝对性和无限性，并假定主体具有完备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能够全知全能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推理和算计，从众多备选方案中选择出收益最大化的方案。然而，在现实的行政决策过程中，主体的认知和判断总是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的影响，而且主体的理性推理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这样，全面理性的理性观与现实的行政决策发生了严重的悖离。

“有限理性”的理性观发轫于哲学家康德的研究。在批判英国的经验主义者的过程中，他曾经提出过关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的观点。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经验世界的事物，而对于超验的或者先验的事物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如经验主义一般试图运用理性去认识超验的或者先验的存在，就必然会引致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所以，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即在于为人的认知理性确立一个基本的界域，从而既能保证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又能为“上帝”、“实体”这些先验的存在保留存在的空间。事实上，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但在于它不仅难以认识超验或者先验的存在，而且对于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而言，理性的认识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集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于一身的西蒙不仅展开了对全面理性观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明确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使得“有限理性”逐渐成为管理哲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观。西蒙指出：“不应该因为对人类行为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性层面的特别关注，就断言人类永远或一般都是理性的”。^① 行政决策主体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其心智资源总是有限的，“有限理性”是主体的基本特征。在西蒙看来，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第一方面，个人受到无意识的技能、习惯和反射动作的限制”，“第二方面，个人受到影响其决策的价值观和与目的有关的诸概念的限制”，“第三方面，个人受到有关其工作事务的知识水平的限制”。^② 作为一种理性观，“有限理性”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其一，相对于行政决策主体的整个精神世界而言，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能力的发挥往往面临着非理性因素的限制和制约。其二，相对于复杂的行政决策环境而言，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认知和推理的能力是有限的。

“有限理性”的理性观的提出，使得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成为一种必要，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为了描述、解释、预测现实的行政决策行为就必须重视对行政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而不是理想化地、简单化地将它们排斥于行政决策的研究领域之外。

2.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心理学是以人类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自1879年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从而标志着现代心理学正式诞生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至20世纪中叶，心理学呈现出爆炸式发展的态势。一方面，通过与具体的研究领域相结合，心理学的学科结构日益复杂，具体化为政治心理学、决策心理学等专业心理学门类。一方面，构造主义与格式塔学派之间、行为主义与现代认知学派之间通过学术争鸣，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思想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这种发展，从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有助于探索、揭示行政决策主体各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为分析、描述、解释行政决策非理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① [美] 赫伯特·A. 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② [美] 赫伯特·A. 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9页。



3. 公共行政学学科知识增长的要求

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在该文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科学的构想，从而使得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应有的位置。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公共行政学只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尽管自其诞生一百余年来，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公共行政学的一些基础领域存在着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于“行政人”的研究，对“行政人”的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性位置，未能取得较大的突破与进展。

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ry）认为，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者以行政效率为价值诉求，以科学管理为手段，大多“忽视组织成员个性的社会和心理变量，而强调他们的理性和外在方面”。^① 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科学管理时期，以威尔逊、古德诺（Frank J. Goodnow）、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家，主要以X理论的人格模型为指导，为了实现公共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化的、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系统的建构，而忽视了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的影响。早期行政学家所主张的工具理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研究范式不仅是一种与客观现实存在巨大差距的理论空想，而且是一种忽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与人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不合时宜。随着公共行政学的演进与发展，西蒙、梅奥（Elton Mayo）、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麦格雷戈（Douglas M. McGregor）等公共行政学家以Y理论的人格模型为指导，将自身的研究聚焦于主体的各种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所以，为了推动本学科知识的增长，公共行政的研究视野不应再局限于制度、计划、技术、时间等外在于主体的物质性因素，而是应当延伸和拓展到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重视从非理性维度来研究行政行为，以把握主体的各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活动规律。

4. 提高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是指行政决策主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按科学决策原则和程序以及科学决策方法来分析事物，作出决定。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则是指主体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采取各种民主化措施，广泛听取公民、社会团体的意

^①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见，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实现，离不开体制建设与主体能力两个方面的条件，即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障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体制，而且需要行政决策主体具有较强的决策能力。这些都需要深化对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研究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有利于探索行政决策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的活动规律，从而构建一整套顺应这一规律的、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的行政决策体制。另一方面，行政决策主体的能谋善断、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实质上是在主体的精神世界中实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功能耦合。因此，研究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有利于从微观视角探讨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适的可行路径，从而为提高行政决策主体的决策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1.1.3 选题意义

恩格斯指出：“人的行为的一切动力，都要经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与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①深入地研究行政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有助于全面、真实地了解行政决策主体的愿望、动机等心理因素的活动规律，从而有助于构建一套科学的、契合其行为活动规律的行政决策模式。本书选题的学术意义集中体现为这一研究是对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在阐述本书的研究意义之前，有必要对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作出一番梳理。

1. 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优点

如前所述，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是指着眼于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数理统计、运筹学为研究工具，以理性的备选方案设计为研究内容、以建立理性决策模型为研究结果的规范性研究形式。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精确性、逻辑性的研究路径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 扩大了程序化决策的适用范围。对于大量的程序化决策，理性维度的研究能够根据既定的信息建立数学模型，把决策目标和约束条件统一起来，进行优化。所以，常规型、确定型的行政决策皆可交由理性决策模型处理，从而解放了行政决策主体，使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决策问题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2) 提高了行政决策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理性决策模型设计是建立在计算机根据程序与数据进行操作的基础之上的，使得行政决策活动由单纯依赖主体的经验和知识，变成建立在严格论证基础之上的科学，有效地排除了主体的各种主观心理因素的干扰，有效地克服了行政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因而能够有效提高行政决策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3) 节约了行政决策的时间。由于理性决策模型的构建，行政决策主体便可以将大量繁杂的数据处理和常规决策提高到自动化、模式化的水平之上，将这些复杂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转化为简单的决策模型操作，从而大大地节约了决策主体的时间资源。

2. 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的理性决策模型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解决许多问题时确实有效。但是，由于理性决策模型与决策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不完全弥合，从理性维度来研究行政决策始终只是一种“应当如何作决策”之类的规范性研究，而不是“实际如何作决策”的描述性研究。所以，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虽然有利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为合理的行政决策过程，但是不能描述现实的行政决策行为。行政决策理性维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一，行政决策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决策环境。对于许多重大的行政决策，所涉及的决策变量往往十分广泛，不仅包括能够予以量化、精确化的各种技术性因素，而且包括难以反映到数学模型中去的情感、意志、愿望等非理性因素。所以，单纯依靠理性模型设计往往难以驾驭复杂的行政决策环境。

第二，有些简单的决策问题，反而被理性决策模型搞复杂了。对于一些重复性极强的日常决策项目，理性决策模型往往仍会计算出一大堆决策方案，使得行政决策主体无所适从，更加难以作出决策。

第三，理性决策模型的操作需要决策信息的精确、详实。所以，对于行政决策主体遇到的情况不明、信息不全面又需要在短时期内作出决定予以解决的决策问题，理性决策模型往往是乏力的。

第四，建立理性决策模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对于重大的、决策者的能够予以量化、精确化的决策问题的分析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而对于一般性的日常决策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采用理性模型的决策方法反而



是不划算的。

3.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对理性维度研究的补充

通过建构理性决策模型来实施行政决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又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这就需要从非理性维度来分析现实的行政决策行为。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考察和分析，有利于从主体的微观心理因素出发来解释、描述和预测主体的行为，有利于概括主体的行为特征，提炼行为变量，并将其运用到理性维度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去，以此作为对理性维度研究的补充。所以，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与非理性维度之间，既存在着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研究属性的差异性，又存在着研究结果的互补性，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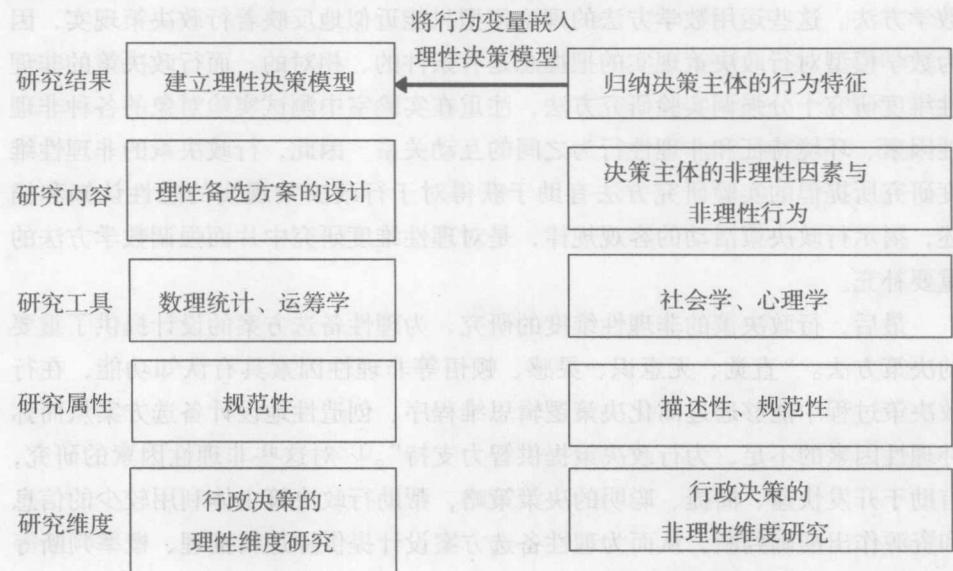


图 1-1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对理性维度研究的补充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对于理性维度研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补充作用：

首先，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评价尺度。行政决策主体需要、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具有较强的意向性、目的性，表征着行政决策对于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确立评价备选方案的主体性尺度，从而使行政决策在主体需要与客观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行政决策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的统一。

其次，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变量。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聚焦于决策问题、决策环境、决策手段等物质性因素，相对忽视了主体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对于决策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影响。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通过对行政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活动规律的探索，有利于概括和提炼主体的行为特征，为行政决策研究提供除客观物质因素之外的主体行为变量。

再次，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在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数理统计、运筹学等数学方法。这些运用数学方法的理论模型只能近似地反映着行政决策现实，因为数学模型对行政决策现实的把握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十分强调实验研究方法，注重在实验室中测试实验对象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环境特征和非理性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所提倡的实验研究方法有助于获得对于行政决策现实的感性认知和描述，揭示行政决策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对理性维度研究中片面强调数学方法的重要补充。

最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方法。“直觉、无意识、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具有认知功能，在行政决策过程中能够通过简化决策逻辑思维程序、创造性地设计备选方案从而弥补理性因素的不足，为行政决策提供智力支持”。^① 对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开发快速、简捷、聪明的决策策略，帮助行政决策主体利用较少的信息和资源作出准确判断，从而为理性备选方案设计提供除逻辑推理、概率判断等理性方法之外的非理性决策方法。

^① 颜佳华，苏曦凌：《非理性因素影响行政决策的作用机制分析——以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功能耦合为视角》，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4期。